

專號引言

二〇一八年是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勱等四位先生聯名發表〈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六十週年紀念，此一宣言現已成為當代思想界重要的文獻，宣言的主要目的乃是探討儒家與中國在當今的處境如何回應的問題，其實也是現代性轉型的問題。進入二十一世紀後，由於「中國和平崛起」以及儒家思想重返當代中國的學術與政治舞台，更直接引發了學界有關「中國現代性」問題的多方探討，中國現代性問題兼有學術與現實的雙重意義，六十年前四位先生聯名發表的宣言孤明先發，其重要性不言可喻。職是之故，國立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人文社會研究中心以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文化與漢學研究中心乃於二〇一八年十月六日—七日舉辦一場「東亞儒學與中國現代性」國際學術研討會。本期專號即是建立在此次宣讀的會議論文的基礎上，經過作者修改以及期刊的審查過程後編輯而成的，專號由六篇論文組合而成。

論及中國現代性，不管就歷史事實或就理論意義而言，日本都是重要的參照系的國家。相較於十九世紀以降的主要帝國主義國家，日本幾乎是唯一的亞洲強權，但它在文化上卻與中國緊密相連，漢字、佛教、儒教、律法是內在於日本文化中的本質性的他者，但這個與中國在歷史、地理上都緊密相連的國家卻又是中國近現代痛苦的主要來源。基於中日之間特殊的文化連結，學者要理解中日近現代的關係，其焦點就不可能和理解其他帝國主義者的觀點一樣，這是可以確定的，本期專號收有三篇與中日現代性議題相關的論文。

首先，董灝智教授提供〈江戶日本人建立「日式區域秩序」的設想——以近松門左衛門、佐藤信淵、吉田松陰為中心〉一文，此文以江戶時代不同時期的三位重要文化人為中心，探討他們的中國觀。比較他們三人的論點與牡丹社事件以後的日本對華政策，尤其是佐藤信淵與吉田松陰的論述，不難發現後世日本軍國主義者的行徑簡直可以說是在執行這些前輩學者的日本帝國的想像。近松門左衛門的《國姓爺合戰》是日本鄭成功觀的代表性戲劇，也是江戶文學的經典作；吉田松陰是日本陽明學的代表人

物，明治維新的重要推手。王陽明、鄭成功是近世中國的天挺英豪，近松門左衛門、吉田松陰兩人的思想皆有極深的中國淵源，但他們居然都成了帝國主義侵華的工具。中日兩國交流史的是非曲折，特別值得省思。

現代中國已不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天下意識」下的中國，近現代中國的問題是在中西交流的背景下被引爆出來的，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案因此不能不有求於國外的資源，二十世紀流行於中國的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都是在這樣的歷史脈絡下呈現的。近現代外國有識之士看待中國，其意義和以往期待的外國人看中國（比如十七世紀的耶穌會教士），意義遂大不相同。「中國周邊有志之士眼中的中國」已構成我們反省中國現代性重要的參考，李宥霆教授〈五四時期跨文化視野下的中國：兼與日本比較〉即是處理「外國學者眼中的現代中國」之議題。

李教授此文以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來華的三位著名外國學者：泰戈爾、羅素、內藤湖南為例，借以說明當時的中國問題。這三位作家、學者立場不同，泰戈爾堅定地站在印度精神傳統的立場，內藤湖南則是有名的「中國近世說」論述的啟動者，羅素是位反帝國主義而又同情中國的英國經驗論學派哲學家。他們三人基本上都反對帝國主義，對中國傳統文化都有較高的評價，也認為中國現代化的行程不應當拋棄以往的文化資產。五四時期外國知識人眼中的中國是個有理論趣味的他鄉異邦，但他們眼中的中國問題不只對中國人有意義，誠如李教授所說的，其實也曲折地折射出「西方的問題」、「日本的問題」與「世界的問題」。

第三篇是區建英教授的〈丸山真男對中國現代性的看法〉。丸山真男對二十世紀日本政治思想史的影響極大，他的《日本政治思想史》雖然寫於年輕時期，青澀之處難免，他自己後來也作了些修正，主要的修正點之一當是賦予朱子的性理學更多正面的價值——此書出版已七十年，至今仍是日本政治思想史的名著。《日本政治思想史》雖然以探討江戶日本的政治思想演變為主，但因為江戶時期朱子學與陽明學頗為興盛，儒家的核心思想又和修齊治平的理念嚴密綁在一起，所以江戶時期日本政治思想的演變不可能不和近世儒家思想密切相關，丸山真男此書所以深刻，在於他掌握了朱子學在江戶的流傳與反動。

丸山真男直接涉及中國現代性的文字相對之下少了許多，相關的研究自然也成比例地少。區建英教授身為丸山真男晚年弟子，她很仔細地爬梳丸山真男對中國現代性的看法。丸山真男晚年對孫中山的思想有較深入的理解，又受到竹內好的影響，他開始注重中國革命的國民性問題的因素，他從中國的革命經驗中看到同期日本缺乏的動能，現代性的追求不能不脫離國民的主體性的基盤。丸山真男和一般漢學家不同之處，在於他有更深的西洋思想的修養，當他開始重視國民性的問題時，他仍不忘批判的立場，他賦予西洋近代的理念極高的價值，認為可以批判現代性的弊端。丸山真男對中國現代性以及以「近代」批判「現代」的定位的看法相當有啟發性，它和同時期的中國哲學名家島田虔次頗有共鳴之處，和一九四九海外新儒家的觀點也可相互發揮，他提出的問題值得繼續追蹤。

本期專號另有兩篇文章討論現代中國兩位哲人的論點，首先是潘光哲教授的論文〈孫中山與中國現代性：「專家政治」和「民主實踐」的思想張力〉，此文討論專家政治和民主實踐的關係。在孫中山的中國政治的構想中，政權與治權的分隔是重要的設計，政權意味著主權在民，人民是政治的主體；治權則是政府要有治理的能力，發揮有效的政治措施。前者有權，後者有能；在制度的設計上，前者設立國民大會，代表全國人民監督政府；後者則是五院制的設計，借施政以完成國民的意志。作為中華民國主要的創造者之一，孫中山的民主理論一方面應乎時代潮流，將政治的主權還給人民，一舉解決了幾千年來中國傳統政治的死結；一方面也強調政府要有能，才能完成政治的功效。對政府施政能力的重視一向是孫中山民主政治論的主張。

潘教授此文將「專家政治」和「民主實踐」的關係放在中國現代史的脈絡下闡釋，指出這兩個概念在現實實踐上常有矛盾。大體而言，專家政治在二十世紀都受到任何政權的正視，只是看重的比重不同。但專家政治的成功不保證民主實踐也可以成功，甚至於有可能恰好相反。潘教授指出的這種矛盾現象在當今的時局下依然存在，也引起了相關單位的重視。目前國內實施了一些補救的措施如審議式民主，多少即是用以回應潘教授所提出的質疑。至於此補救措施是否可以濟現實政治運作之窮，答案似乎不

是那麼確定的。

秦燕春教授〈重審「抒情傳統」——再論唐君毅、胡蘭成交往的文化史意義〉一文是此期專號中唯一一篇獨立討論唐君毅先生理念的文章，但「情」本來即是五四重要的議題，現代性議題的光圈不可能不照耀人的情性。德先生、賽先生是五四文化運動的兩個主要理念，可謂共識。然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新文學運動不可分，五四新文學的主調可以說是「個人」的發現，「個人」的概念意味著個體性的價值、感性之人的價值，這種新的人觀往上還可追溯到梁啟超的新民說。作為二十世紀中國最重要的文化運動的五四運動，它如沒涉入近代轉為現代歷史過程中的人的概念的重新打造，這是難以想像的。而在新的人觀當中，「情」居有核心的地位。一九四九以後，海外中國興起「抒情傳統」論述之風，這場聲勢甚大的論述可以說是「接著」五四新文學運動發展出來的。

秦教授此文即是以唐君毅、胡蘭成兩人的交往重新反思抒情傳統的意義。胡蘭成是二十世紀中國非常值得省思的一位文人，胡蘭成本身自成一個人現象。胡蘭成的文字有妖魅的吸引力，他也有禮樂王道的理念。但在現實經驗上，他的勇於參加抗戰時期的汪政權，以及他不理世間禮法以及一般處世規範的戀愛事件，都是令人擡舌瞠目難以相信的。但行事這麼有爭議的人物，卻可攜獲二十世紀中國最有才情的女小說家的身心，還吸引了三三集團的一群才子佳人。不但如此，他還交上了二十世紀儒林代表人物的梁漱溟、唐君毅。胡蘭成現象，尤其胡蘭成和唐君毅先生的交往如何解釋，顯然已經不是個案之事了，而是事關一代精神面貌如何解釋的一大事因緣了。秦教授此文涉入此理論風波，並作了相當穩當的判斷。

楊儒賓的〈當代中國的黎明——解讀晚明思潮論〉是篇較宏觀的論文。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光譜中，晚明文化和民國新文化一直有較密切的關係。兩者間關係的連結主要有二，一是在文學、藝術領域，晚明的戲曲、小說、小品文和五四新文學之間勾連得相當緊密；一是在歷史領域，當五四新文化運動往左傾斜以後，左派文人追溯中國革命的正當性，或者說本國範圍內的階級史觀的脈絡時，即會追溯到晚明興起的經濟、社會現象，他們稱之為「資本主義萌芽說」。但將民國新文化往晚明思潮連結者

不只左派學者，新儒家學者也是如此，從五四運動早期的梁啟超、梁漱溟以至一九四九海渡來台的新儒家莫不如此，他們提出的論點，筆者稱之為「良知學轉出說」。同樣將中國的現代性議題溯源至晚明，左派學者與新儒家學者卻看到兩個不同的源頭。

楊文分析了「資本主義萌芽說」與「良知學轉出說」兩說的得失，並檢引了島田虔次《中國近代思維的挫折》的解釋作為補充。楊文的結論主張「資本主義萌芽說」作為一種經濟學史的觀點可備一說，但此說沒辦法解釋中國現代性核心訴求的「民主」、「個體性」與傳統中國思想之間的連結，「良知學轉出說」則可解釋明末三大儒的訴求以及晚明文學的主張何以生起。

六十年前海外新儒家四大儒的宣言是百年來新儒家運動重要的一環，民國新儒家的興起則和中國現代化的需求有關，從第一代新儒家的梁漱溟、熊十力以至渡海三家的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甚至於我們還可往上追溯到梁啟超等立憲一派的儒紳，他們的學術關懷可以說都有意於儒家的現代轉型，現代轉型的儒家用以解釋並參與整個中國現代化的轉型事業。儒家因素在現代中國的塑造過程中，不只是被批判的負面因素，它更是批判性的建構因素，「儒家與中國現代性的關係」極為複雜，這個議題仍有待學界進一步的探索。



國立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講座教授